

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

吴 其 昌

吾友张晓峰先生邮示其近著《梁任公别录》，读竟，泫然流涕。其昌以海隅稚学，幸得侍我先师任公暮年讲席，以逮于易箴。故往来清华园及天津马哥保罗路寓宅者颇久，尝夏夜侍坐庭中，先师缕述变法之役及护国之役身所经历者，恒至深夜；一夕，竟至东方黎明。所谈颇多世所未知，今濡笔追录，以应晓峰先生督令拾遗之命。

先师曰：余在护国之役略前，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，不但不反日而已，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。护国一役以后，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、可怖与可恨。憎日、恶日与戒备日之念，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。戊戌亡命日本时，亲见彼邦之兴起，如呼吸凌晨之晓风，脑清身爽。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，人人乐观活跃，勤奋励进之朝气，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，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。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，疲癃残疾，肮脏邋遢，相形之下，愈觉日人之可爱、可敬。当时日人甚爱我、助我，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，与日本并立为强国，为黄帝后裔两柱石，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。故愈觉日人之可亲。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，始觉日人之可恶，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。“二十一条”之提出，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，损人利己，卖友打劫。然而知日本之

“凶”，而尚未知日本之“毒”也，感觉日人之可恨、可恶，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。松坡^①既行，袁氏日夜派便警巡逻守吾门，余买通街头胶皮车伕，与之易服，夜逃。甫离津，袁氏已觉，杀其便警。严命其沪上逻犬捕予，期在必得，“务获梁启超，就地正法”之上谕已布，上连像片，较清廷尤密。予惴惴不知死在何处，但暗中如有天神护卫，化险为夷，逢凶为吉。独自无僂，痴思妄想，岂其国运未绝有天神呵护耶？则又哑然自笑。自是由津而沪而港，此疑谜终不能破。至港，日人始明目张胆助余，始恍然暗中护卫我者，非天神也，乃日本人也。由港至越，日本动员其官军、商、居留民、间谍、浪人，全力以助余，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，不能过也。夫日人果何爱于余，何求于余，而奉我如此乎？在越南道中思之，不觉毛骨俱悚，不寒而栗。遂转觉每个日人，皆阴森可怖！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，犹未尽也，乃神秘之魔鬼也，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，他日欲亡我国，灭我种者，恐不为白色儿，或竟为倭人也。然吾乃永远持“中国不亡论”著称于世者，待我人戒备之对象，当在彼不在此……先师之语尚繁，谈彻通夕不寐者，即此事也。时为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新秋，济南惨案尚未发生也。先师夏间家居，必脱袜、赤足、拖鞋。而日人官吏新闻记者拜访频数，阖者报客来，必颦蹙连呼：“讨厌讨厌，又来保卫我了！可怕可怕。”每次必然冠带见客。东客去，急跣足如故。

戊戌之役，夜话时，亦不倦缕述，大体与世所闻者不殊，袁世凯卖主求官，鬻党媚后，人人所习知。然写近百年史者，

^①松坡：蔡锷，原名艮寅，字松坡，湖南邵阳人。1915年袁世凯开始准备复辟帝制，蔡与梁启超密商后，于12月潜回云南，准备讨袁。

以为袁氏之与闻康事，乃出于谭嗣同夜半之劫持，则不深悉曲折也。据先师所亲述：袁氏变法维新之见解，实出于自动，拥德宗以武力行政之计划，实亦发动于袁氏，而决非壮飞（谭氏字）所强迫。事后细思，乃知戊戌之际，袁氏即已潜伏取清廷而代帝之心矣。其用心深长细远，吾辈纯白书生尽为所欺至十馀年之久，真一世奸雄也。袁氏初从吴忠壮公（长庆）于朝鲜，豪爽奔放，以一时人杰自命。时与马相伯（良）、眉叔（建忠）、张季直（謇）等新进名流，下其议论，故欲强中国，革腐政之心，袁氏实在不在人后。又眼见朝鲜为日人从其手中夺去，经此刺激，其爱国之心，实亦强烈而真挚，并不由于壮飞一席之语所启发。惟自始至终，一“私”字横亘于胸，必须将中国移为其袁氏之私产以后，乃极力整顿，使成为富强；此所以身败名裂，贻祸中国无穷也。未变政时，袁氏深恐中国即刻亡，乃协谋变政。及变政略有端绪，又恐中国之强由翁、康、梁、谭，而已则为褊裨，故卖主而告密。及变政既已失败，又恐大权在裕禄，而已则为褊裨，乃复推行新政于直鲁，培实力而博民心，俟良机以倒清廷。事后推寻其线索，其称帝之念，固已潜蓄于戊戌以前，一贯而未尝变也。

先师于生平死友中，最钦重浏阳谭先生嗣同。述其赴义时忠烈之轶事，闻之眼湿。大祸既迫，德宗央英使馆护南海先生出京。然未央日使馆也。时日人初行新政，一颦一笑，惟欧洲是效，以为欧洲之文明政治，有保护他国政犯之举也，亦欲在中国有所树为，一以夸耀文明于欧人，一以树势力于中国政党。时日驻京公使为林权助，事先已奉有相机保护政治犯之密令，至是乃自献殷勤，戮为营救。先以绿呢大轿接壮飞至馆，继以绿呢骡车迎余。时京中（即在公使馆）亦尚未具有新式马车也。壮飞与余处日使馆二日，日夜计划营救皇上之策，乃计

算南海先生之行踪。壮飞忽如有所省，一入人房中，阖户甚久；出，乃以一文件，命公使馆役往投某衙门。笑谓余曰：“还须告他一状。”余茫然不知所谓，壮飞终不肯言。事后，都下忽盛传谭某告发其子嗣同忤逆不孝，断绝父子情谊，固得获未连累。度当日之所为，即此事也。血热而心细，身殉祖国，而老父获全，未有如壮飞之壮烈也。日使林权助，饰其夫人之车，强余与壮飞离京，壮飞坚辞谢曰：“闻之西史，革命则无不流血者。中国革命之流血，请自嗣同始！”居使馆三日，脱奔清廷自首，曰：“嗣同请以颈血洗涤中国之腐政！”遂斩于菜市口。六君子成仁之日，予尚居东交民巷日使馆，悲惊晕绝。又数日，林使强纳余于其所预饰之夫人车中，外坐婢媪，卫士呵殿，扬言日本钦差大臣家眷回国，遂出京至津，直坐其兵轮赴日。

先师遂连类而涉及富顺刘先生光第，曰：裴村（刘光第之字），亦一至可歌泣之人也。裴村讲朱子学，作黄山谷诗，皆深造。其持身精严清苦，为京官十馀年，寄居西直门外一小庙中，至死未尝赁屋于城内。余与裴村非故交，疏往还，不知其身世之详。因新政，始略与接触。然每见之，肃然敬其为人。裴村一子亦至孝，临斩，哭奔菜市口，向监刑官稽首号恸，乞以身代父死，叩头流血。不许。抱父首大哭，呕血，不久亦以毁卒。孤臣孽子，哀动鬼神！先师曰：“些事至今思之，犹酸我鼻。中国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兴，非天理也。”

先师述：袁项城拒谏饰非，作伪术之巧妙，登峰造极，古今无可伦比。时帝制论已尘嚣全国，冯华甫（国璋）自南京来津，邀余同往作最后之谏诤。华甫曰：“我之辩说远不如子，子之实力亦不如我。必我与子同往，子反复予以开道，而我隐示以力为后盾，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免。”余诺之。乃尽一日

夜之力，密草谏说纲要，至数十条，竭尽脑汁，凡可成为理由者，无不备举，欲为垂绝之国运，亿万之生灵，打最后之一针。及二人联翩入新华宫，项城闻吾等至，喜动颜色。酒酣，余正欲起立陈述，项城先笑曰：“二公此来，吾知之甚稔，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。我反问二公，袁某欲作皇帝者，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绝种乎？抑思作万代皇帝而无穷乎？”余与冯愕然未答。袁又笑曰：“除非痴人，自然欲作万代天子！”乃喟然叹曰：“我有豚犬二十余人，我将尽数呼出，立于二公之前，任公君最善知人，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，可以继立为皇帝者，可以不败我帝业，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；任公，待君选出以后，我再决定称帝。如是或可称帝二代！”余与冯四目相视，嗒然若丧，怀中万言书，竟一字不出。袁诸子环立侍宴，幼小者乳媪襁褓侍，袁忽变悲痛之容，曰：“我如许豚犬，无一克肖，无一非庸懦纨绔，然父之于子，孰不疼爱，我虽怒此辈不肖，然仍不愿因我造孽，他日为别人作鱼烹杀也。我百年后，敬托二公善护之。”余与冯迄辞出，竟不能一提“帝制”字。

述及蔡将军锷，先师曰：松坡，长沙时务学堂中齿最稚之学生也。时务学堂封，学生络绎东渡，静生（范源濂）与松坡家最贫，时我辈亡命客亦穷甚，无大力周济，所以援之者至菲薄，松坡与静生常常衣囊中只剩日币三数有孔铜圆，忍受数周至数月。静生立志教育报国，余甚嘉之。松坡最瘦小，体极弱，必欲学陆军，余百方规劝不肯听，不得已任之。庚子汉口革命之役，佛尘（唐才常）已回鄂发动，余亦秘密返沪。时务学堂高材生林圭、李海寰诸君，已随佛尘在汉实际工作，久之不得佳耗，松坡随余在沪，惶惶不安，请于余，亲至汉探助。至汉，佛尘命返湘，乞助于黄泽生将军。黄，老成练达材也。得松坡，即留之不放行；且大诟梁任公、唐佛尘无故牺牲有用

青年。松坡愤极与之高声抗辩，黄充耳不闻，强留之。余又不得松坡行踪，愈惶急，决亲身赴汉。船票已办就，因亡命，不敢逗街埠，准时而往，则此船以货少早半小时启碇矣。余大怒，顿足而骂。无何，汉口事发，张之洞淫戮我民族之志士，唐佛尘率其弟子林圭、李海寰等五人继戊戌六君子之碧血，掷头颅以献祖国，即世所称庚子六君子者也。松坡以黄将军之留，余以船期之误，皆幸得免死。

先师又言曰：唐浏阳与谭浏阳血性之热烈同，性格之卞急同，学问之幽隐僻奥同。《觉颠冥斋内言》与《仁学》固有甚相似之点也。

（选自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 36 辑，1989 年出版）

记参与炸良弼案的 同盟会员王崇义

胡 玉 树

彭家珍是辛亥革命的烈士，他以舍身炸良弼的英勇行动，为这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提起当年的炸良弼事件，大家都知道陈宪民等人是彭家珍的战友、助手；在这里，我要介绍的却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王崇义。王崇义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的，只是由于他在试制炸弹时不慎被炸伤了右眼和右手，而未能直接出面配合彭家珍的行动罢了。

王崇义和我是同乡，他比我大十一岁。炸良弼事件发生后，他隐居北京西山温泉。20年代初，我留法勤工俭学归来，也定居这里，我们即结成好友，直到他病故。

王崇义，号集生，188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西田果庄村。他自幼家贫，少年时即不得不外出乞讨谋生。后来他来到天津，得识同乡段子钧（宗林）^①，由段保荐至天津觉民中学任庶务。该校校长王化初亦高阳县人。在津期间，王崇义接受了民主共和抗清的新思潮，并积极地进行宣传。其后又结识了汪精卫、顾孟余、李石曾、魏道明、郑毓秀、孙岳等人。此时的王崇义，已是京津同盟会会员。

段子钧，曾任民国时平绥铁路局长。

1910 年，王崇义来到北京，住段子钧家。段家是当时京津同盟会会员经常聚会活动的场所。据段子钧元配夫人回忆，当年住房的后院就曾埋藏有炸药，后来由于形势所迫曾多次搬家，以致炸药是否起出都记不清了。王崇义参与炸良弼之前，还曾参加了炸摄政王载沣的行动。据王崇义之长子王永增先生介绍，当时，“由汪（精卫）、顾（孟余）、段（子钧）、孙（岳）筹筹划，由王崇义执行”。详情待考。

王崇义曾亲口对我讲过他与彭家珍谋炸良弼的经过。

当年，他与李石曾、汪精卫等人同是同盟会暗杀团的。在刺杀袁世凯失败后，他曾与李石曾、彭家珍等几次碰头研究，总结经验教训。彭家珍提出要改变街头狙击的办法，因为那样投弹准确性差，且敌人易逃脱和反击。所以，要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。李石曾提出炸弹的威力还不够，要设法加强。按照李石曾的安排，王崇义同彭家珍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东头租了一所僻静的小院，专门试制威力大的炸弹。一日傍晚，王崇义正在屋内摆弄炸弹，不慎走火，当场被炸伤右眼和右手。所幸地处城墙根附近，未被清兵察觉。这样，王崇义无法亲自与彭家珍一起去炸良弼了。

以后，同盟会会员多次聚会，商讨暗杀事。李石曾提出“同时行动，分头出击”的方案。当时还约定，如果一旦事未成而被捕，落在袁世凯手中，即称良弼所遣；落在良弼手中，则说是袁世凯所派。众人一致称赞通过。

大概是彭家珍考虑到“分头出击”的方案难以成功，遂决定一人率先行动。此事王崇义是知道的。

1912 年 1 月 26 日（腊月初八）晚，彭家珍探知良弼等亲贵将于次日到内廷，借领赏腊八粥之名集会商讨进攻南方革命军的策略。彭觉得机不可失，决心趁此机会投弹击毙良弼。主

意已定，彭立即去隐藏地点取回炸弹，然后留下了给诸同志兄弟姐妹的“绝命书”，遂转移到金台旅馆，身着高级军官服，自称为清军标统崇恭。当彭家珍辗转来到西四北红罗厂良弼住宅时，王崇义也潜伏在附近的胡同（可能是拐棒胡同）探听动静，准备接应。

彭家珍至良弼住宅，投崇恭名片求见，仆人答良大人未归，请他到客厅等候。彭即来到客厅，等候多时未见良弼归来，遂走出门登上马车，打算到善耆家寻找。才走几步。但见良弼的马车从对面驶来。彭即令回车，在良宅门口下车，立于上马石旁挡住进门之路。良弼车到，彭家珍拦在车前行礼，良弼右脚刚下车，彭即持名片迎上。灯光下，良弼发觉来人面生，急欲躲闪，此时彭家珍已将炸弹扔出，顿时，一声巨响，良弼当即倒地，彭家珍自己也不幸头部被炸，壮烈牺牲。此时已是 1 月 27 日凌晨。

当时良弼宅乱作一团，巡夜的清兵赶到，见人即抓，形势紧迫。王崇义判断彭家珍凶多吉少，钻进小胡同躲于大树下直至天明。他得知彭已牺牲，为躲避追查，遂来到西山温泉村，以后即定居下来。

民国成立后，汪精卫、顾孟余、魏道明、李石曾等人均已成为政界要人，惟有王崇义不愿出山，独在温泉居住。

民国初年，由李石曾倡议并资助，王崇义等人在温泉办起女子中学，继而又在北安河办起温泉男子中学，后归属中法大学附中。不少知名的政治家、科学家、作家，例如严济慈、杨沫等，当时都曾该校学生。

温泉村的泉眼处（即温泉池）过去残破简陋，无人管理。经由李石曾、王崇义向各界筹款，搭起棚子，另建房十餘间，将温泉水引入室内。另在南山坡建起疗养院，由西医大夫何绍

文任院长。此即温泉地区最早的疗养院。为筹集建院资金，当时昆曲名演员韩世昌、白云生都曾在温泉村大戏台义演过。再后，由李石曾、蔡元培、吴稚晖等人发起成立温泉同治会，宣传洗温泉澡的好处，使温泉名声大振。当时，社会名流、达官显宦闻风而至，一些有钱人在温泉村的显龙山上也盖起许多别墅、山庄。

当年，王崇义的宅院在显龙山的西南角上，我家在山之北的平地，相距甚近（显龙山是一座仅高二三十米的小山）。我们朝夕相处，无话不谈，可谓诤友。王崇义为人豪爽、耿直，好打抱不平，乐于助人。

兴办温泉中学后，王崇义逐渐将兴趣转移到中医上，经过刻苦学习钻研，又得著名御医赵友琴的指点，竟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。王崇义坚持为村民义务看病，有时还免费赠药，深得当地村民好评。至今，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他仍称颂不已。

1946年，王崇义因患高血压、脑溢血，病故于阜成门内的中央医院，时年61岁。同年葬于温泉村东的荒地。解放后，因在该地兴建百货商店，又将王的遗骨葬于显龙山之南。

王崇义病故后，子女在清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他当年行刺用的手枪，解放后已上交当地公安局。

如今，王崇义在显龙山上的房子仍在，已属温泉结核病院。

（选自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28辑，1986年出版）

谋炸摄政王馥事

房少桥

吴玉章同志在《辛亥革命》一书中记述：1909年，同盟会所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后，许多革命党人愤不欲生，亟谋刺杀清朝官吏，以为报复。为刺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——摄政王载沣，决定喻云纪、黄复生于1909年秋后赴北京组织机关，而由吴玉章同志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。喻、黄到北京后，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像馆，随即回日本去取炸药。1910年4月，谋炸摄政王未成，守真照像馆被抄，黄复生、汪精卫被捕。这件事距今已经七十年了。兹就记忆所及，补充一点有关的事实。

清宣统元年、二年，我在畿辅中学念书，因家住前门西河沿，每天上学和放学回家，都要路过琉璃厂火神庙口。守真照像馆就开设在此处的路北，一间小门脸，后面通胡同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家住火神庙夹道，叫胡润仁。他与守真照像馆的汪精卫相识，通过他的介绍，我也与汪精卫作了朋友。我那时好玩，样样都来，和胡润仁一道常去守真照像馆拉琴唱戏玩乐。照像馆里有三个人，一个是黄复生，一个是汪精卫，还有一个姓王的管照像的北京人。记得黄兴也到照像馆来过，不过是化了装的。

汪精卫给我介绍过一位杜黄女士，四川人，她的丈夫叫杜

得愚，号若舟，五十多岁，是户部的主事。杜黄女士那时三十多岁，生得漂亮，能说会道，非常活跃，她与我家里的女眷慢慢混熟，做了朋友，时常到我家玩。我父亲房星桥，其时供职清宫太医院，是京城有名的外科大夫，家里自然阔绰。我和杜黄女士一同参加过湖北赈灾，在天坛、先农坛搭个大席棚，义卖赈灾券。她的两个姑娘（二十多岁，前妻生的）也参加了。

炸摄政王之前十多天，杜黄女士由广东回京，我家里让我去前门车站接她，我就去了。那时出站的人都要经过海关检查。杜黄女士下车后，递给我一个提包，让我拎着去找与我父亲相熟的海关总办萧某（四川人），带出站后暂时寄放我家，等她去取，她就独自出站了。我照着她吩咐的，上楼见过萧老伯伯，未经任何检查便出站了。这个提包我拿回家放着，大约过了十多天杜黄女士才来取走，取去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黄、汪被捕的事。

守真照像馆被抄那天，我和胡润仁放学后回家，路过火神庙口，还想去照像馆玩，结果发现那里已被大队军警围满，事态严重。我问胡出了什么事，他也不知道。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是牵涉到谋炸摄政王的案子。

黄复生、汪精卫被捕后，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是用炸弹谋炸摄政王，我这才想起杜黄女士让我拎回的那个提包，才怀疑那里面藏着炸药。我父亲却断定那里面就是炸药，为此惊恐不安。他怕我受牵累，就让我到东安县（今河北安次）去躲起来。过了两个月，没听见什么风声，才回北京来了。黄、汪二人后来听说是托了肃亲王善耆从狱中保出来的。杜黄女士倒没有出什么问题，继续与我家往来，后来同她丈夫一起走了，大约是回四川了。

辛亥革命后，汪精卫来北京任财政部长。我这时已从法政

大学毕业，同学们知道我认识汪，都说你们既然有那样的关系，还不快去找他。但我始终一趟没去。听说胡润仁去找过汪精卫，后来我看见胡穿着军官服，想必是做官了。

何大钧笔录 1980年

（选自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 11 辑，1981 年出版）

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

寇 长 城

晚清的变法维新运动，是作为爱国救亡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。这个运动的倡导人之一梁启超在他所著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中，称清宫太监寇连材为“义烈宦官”，并且代寇连材立传，附于殉难“六君子”传之后。近期上演的话剧《清宫外史》，也有寇连材这个角色。他深明大义，赞助维新，威武不屈，视死如归。

寇连材乃是我的亲祖父。我们家族和乡亲中，至今仍然传颂着寇连材的事迹。现在记述如下，以补正梁启超所记的不足与不确之处。

人们知道，太监是没有亲生儿女的。寇连材怎么会有亲生的子孙后代呢？这要从他的家世说起。他原名寇成元，进宫以后被赐名为寇连材。1868年，生于直隶昌平州（现在是北京市昌平区）南七家庄，家境小康。其父寇士通，精通文墨，秉性豪爽，好打抱不平，为受欺压的穷苦农民出气。寇连材读过几年私塾，稍大即边务农边自学，不仅读了经史子集，还通过在城里做事的亲友，借阅了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写的书籍报章。加之京畿消息灵通，对于朝廷的帝党后党之争，以及列强的步步侵略，也多有所闻。寇连材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国家积弱积贫，势有亡国之患。因此，他日夜忧愤，不时地与亲友谈

论，表示要为国为民效力。他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，练得一身好拳脚，考个秀才、贡生绰绰有余。但是，由于他厌恶八股文，两次县试都没有考中。

那年头时兴早婚。寇连材十五岁时与铁匠营村张氏女结婚，生有两男一女。1891年，寇连材23岁时，他父亲寇士通为管穷朋友的事，与鲁疃村的大地主赵灿打官司。赵灿的儿子、女婿都在衙门里做事，官官相护，反诬寇士通有通匪嫌疑，结果有理的官司没打赢，自家的几十亩地倒被赵家讹去，几乎倾家荡产。寇士通一气之下，卧病不起，含恨而死。

国仇家恨，使寇连材横下一条心，毅然自己动手净身，以便进宫“陪龙伴驾”，直接参预最高统治层的政治。这里需要说明，清朝初年，宫里曾经订有“内监言国事者斩”的家规。后来，这条家规就失效了。皇帝或太后要派太监了解宫外的动向和王公大臣的密事，王公大臣要向太监打听皇帝或太后的心思，无形中太监成了他们之间的桥梁，不但“言国事”，甚至代皇帝、太后出谋划策了。

寇连材自己动手净身的事，在家里、在附近村镇都大为震惊，使亲者痛、仇者快。谁都知道，小老百姓进皇宫当太监，和判终身监禁差不多，能爬上高位、有钱有势的太监只有那么几个。寇连材说：我也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也留恋母亲、妻子和儿女，但是，我不能眼看着国家任人宰割，不能坐等着当亡国奴。我要用岳飞的话激励自己：敌不灭，何以家为？

经过三个多月的诊治调养，寇连材的伤好了，即去北京地安门外五斗钱庄，他二姐夫在钱庄管事，托他设法引荐入宫。这个钱庄的东家，有一个哥哥在宫里当太监，人称“梳头王”，有一天，王太监来钱庄，寇连材的二姐夫把他引荐给王太监，并说明意图。王太监一看寇连材仪表堂堂，眉清目秀，谈吐文

雅，就有几分喜爱。当面叫寇连材写几个字，练一趟拳，王太监越发赞叹不已，连声说：“有出息，有出息！”随后叫寇连材把姓名、年龄、来路写清楚，交给他带进宫去。寇连材当时就行大礼，拜王太监为师父。按照宫里的惯例，新太监进宫，要在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选中以后，才拜师父。宫里的等级森严，规矩大，礼法多，需要师父的指教和关照。当师父的都是地位较高的太监。徒弟有出息，师父也光彩，并且能得到徒弟的孝敬礼物。当下，王太监认为寇连材准能出人头地，很乐意有这样的徒弟，于是就打破惯例，在宫外收徒了。

不多几天，王太监兴高采烈地来到钱庄，告诉寇连材，已经跟内务府说好，叫他准备一下，换上新衣帽，明天上午进宫。

进宫以后，内务府还没有安排好候选日期，暂且叫他在东夹道打杂儿。一天，寇连材从屋里出来倒洗脸水，被慈禧太后看见了。这一表人才，着实引起了慈禧的注目，传旨把他叫到跟前，问过姓名、年龄、来路，端详良久，甚是喜爱，当即留在身边，做梳头房太监。之后，又见寇连材能写会算，能说会道，就让他掌管自己房里的会计。

尽管慈禧太后对他十分宠爱，格外加恩，但是，寇连材耳闻目睹慈禧处理内政外交的种种做法，虐待光绪皇帝的种种情形，心中非常愤慨，曾多次婉言进谏。慈禧以为他年少无知，不甚介意，捺着性子未加罪于他。

尔后，寇连材几次请假回家（一般下层太监是很难回家的）。他作为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，六部大臣都得另眼相待，昌平州的各级官吏听说他衣锦荣归，更是争先恐后地前来巴结。鲁疃村的赵灿，早已闻风逃匿，怕寇连材找他报仇。但是，寇连材豁达大度，以国事为重，不再计较私仇。他叫人告

诉赵家，只要他们痛改前非，不继续横行霸道，我寇某愿与他家和解。赵灿听说，喜出望外，很快回到鲁疃，两家相安无事。

寇连材每次回家，都乘坐宫里特派的白马轿车，有兵弁护卫。他从来不抖威风，不仗势欺人。离村一里许，就下车步行，见到乡亲都主动打拱问候。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，清王朝一败涂地。1895年，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割地赔款。消息传遍京城内外，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“公车上书”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。这时，慈禧太后把寇连材安插到光绪皇帝身边，名为侍候皇上，实则令他监视光绪，随时密报。

初期，光绪皇帝对寇连材存有戒心。后来两人由谈论古文到议论时事，光绪得知寇连材胸怀大略，有胆有识，极力赞助变法维新，很快就把他作为自己的贴心人和助手，器重他，信任他，与他商讨大政方针，派他给维新派传书递简，从中穿针引线。

据寇连材回家时说，光绪确实是个好学不倦、思想清新、励精图治、礼贤下士的好皇帝。他不但阅读中国古书，更认真钻研翻译过来的外国政治论著。他讨厌宫廷的繁文缛节，办事讲求实际。对士大夫以至对太监、宫女，他的态度和蔼，话语轻柔。 he 可以和寇连材促膝谈心到深夜，择善而从，并不因人废言。太监宫女做错了事，他从来不厉声斥责，只打过一次李连英，还是因李欺人太甚。他克勤克俭，不计较吃喝穿戴，不好酒色，不劳民伤财。他的品德和言行，与慈禧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寇连材每提到光绪皇帝，都肃然起敬，表示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决心。

1896年农历二月初十早起，寇连材从光绪那里来见慈禧，